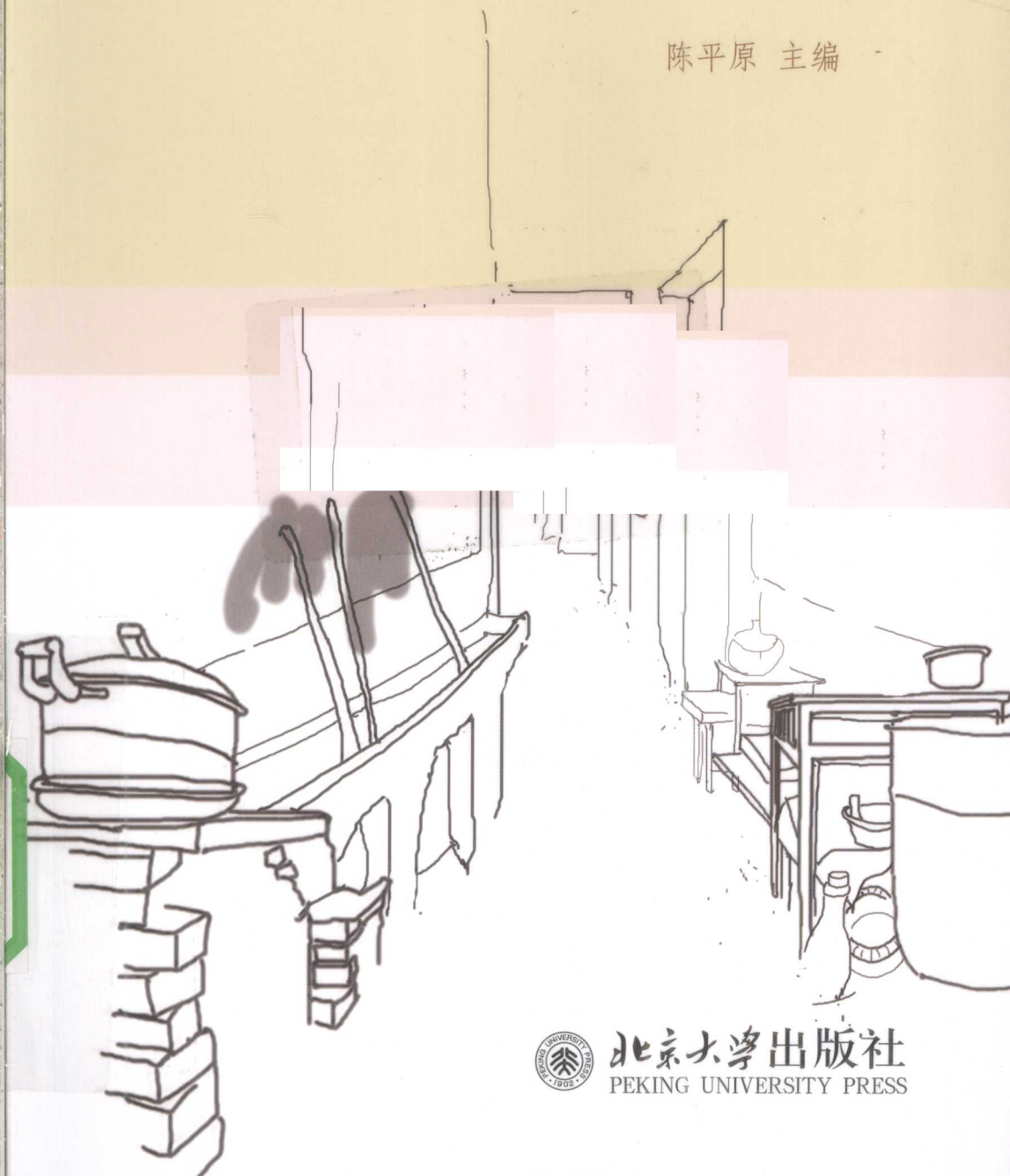


燕园记忆

筒子楼的故事

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园记忆

筒子楼的故事

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子楼的故事 / 陈平原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

(燕园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7267-4

I. ①简… II. ①陈…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8879号

书 名: 简子楼的故事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策划编辑: 高秀芹

责任编辑: 梁 勇

封面设计: 邱 懿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267-4/K·06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2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

(代序)

陈平原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去年3月，北大出版社高秀芹博士来谈书稿，听我讲述当年借住女教师宿舍的尴尬，竟拍案叫绝，说类似的“筒子楼的故事”，许多北大教师讲过。那是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高博士建议我略做清理，为自己、也为后人，编一本好玩的书。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此类“苦中作乐”，自己珍惜，旁人未见得能理解，更不要说欣赏了。

几天后，同事聚会时，我谈起此事，竟大获赞赏。于是，乘兴发了个短信，试探一下可能性。说清楚，这不是北大中文系的“集体项目”，纯属业余爱好，很不学术，但有趣。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再说，整天跑立项、查资料、写论文，挺累人的，放松放松，也不错。4月1日发信，说好若有二十位老师响应，我就开始操作；若应者寥寥，则作罢。一周时间，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加盟的，超过了二十位。这让我很是得意，开始底气十足地推敲起出版合同来。

接下来的催稿活儿，可就不太好玩了。约稿信上称：“文体包括散文、随笔、日记、书信、诗歌、小说等，唯一不收的是学术论文；全书规模视参与人数多少而定；文章篇幅不限，可自由发挥。不求文字优美，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昔日邻居，以免引起‘法律纠纷’。利用暑假写作，10月交稿，明年春天由北大出版社刊行。”说实话，大家都很忙，

此计划可能推迟，从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平日里，不断转发同事文章，利用这一方式，温和地提醒：有此一事在等着你。到了暑假或寒假前，再稍为督促一下：“暑假将至，本该放松放松；苦热之中，竟然还邀人撰稿，真是罪过。好在此类‘豆棚闲话’，尽可随意挥洒。”“平日里，大家忙于传道授业解惑，放寒假了，想必可稍微放松，写点‘无关评鉴’的文字了。这些蕴含真性情的随意挥洒，十年二十年后，说不定比高头讲章更让你我怦然心动。”这都是真心话。此类闲文，老师们可写可不写；别想得太伟大，基本上是自娱自乐。

当初决意编此书，脑海里浮现的，一是郑洞天的电影《邻居》，一是金开诚先生的随笔《书斋的变迁》。1981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二年获第二届金鸡奖的《邻居》（郑洞天导演），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形态——筒子楼里，两两相对，排列着几十个狭小的房间；邻居们大都属于同一个单位，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过道里堆满杂物，只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开饭时，满楼道飘散着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环境如此艰难，邻里间却温情脉脉。今日习以为常的“走后门”（房管科吴科长偷偷把一间小屋分给了省委董部长的侄子），当初竟义愤填膺。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氛围，大家对公平、正义等有很高的期待。也正因此，才有了电影里那“光明的尾巴”：市委决定停建高级住宅，着重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一半是自嘲，一半是期望，80年代的读书人，大都记得《列宁在十月》中的豪言壮语：“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起转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的金开诚（1932—2008年）学长，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书斋的变迁》。此短文流传甚广，后收入他的《燕园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我虽然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年爱人带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18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

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文章。”据说，老友沈玉成来访，看到此情此景，戏称将来为金先生写传时，一定要带上这一笔。

如今，金、沈两位先生均已归道山，轮到我来编书，猛然间想起20年前读过的文章，翻检出来，摘抄一段，以展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阅读此文，后人很可能感叹唏嘘。可金文的主旨不是抱怨，而是借十年间自己如何从没有书斋到有“床上书斋”到“桌面书斋”再到“小康书斋”，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80年代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那一代知识人的大局观，作为后来者，你不一定认同，但千万别轻易嘲笑。

出版社要求申报选题，我脱口而出：“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不用说，那是套用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如此“信口开河”，日后再三斟酌，觉得不妥。原因有三：一怕拾人牙慧，二担心限制老师们的思路，三不希望此书过于文学化。但有一点，我认定：就像台湾的“眷村”，大陆的“筒子楼”，既是一种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倒影、文化品位、精神境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筒子楼，也都发生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不夸耀，不隐瞒，不懊悔，只是如实道来，这样，琐琐碎碎的，反而动人。

关于此书的编辑工作，我有五点技术性说明：第一，学校不断调整布局，同一座19楼，一会儿住的是男教工，一会儿又变成了女教工宿舍，端看你何时入住；第二，文章有时29楼，有时29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文革”前叫“斋”，“文革”中改为“楼”。第三，未名湖边

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乃原燕京大学建筑，不按数字排列。第四，为了叙事完整或文气贯通，集中文章，有的溢出了题目，兼及学生时代或搬进单元房后的，编者也不做裁撤。第五，文章排列顺序，不叙年齿，依据的是正式入住筒子楼的时间。

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趁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

对于昔日筒子楼的生活，说好说坏，都不得要领。你想很辩证地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我的想法是：先别褒贬，也不发太多的议论，“立此存照”，供后人评说。

本书的征稿工作，得到了北大中文系周燕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

2010年2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	陈平原（3）
形形色色“筒子楼”	陆颖华（1）
怀念 50 年代住在未名湖畔的朋友	唐作藩（19）
燕园忆旧（1950—1954）	王理嘉（24）
孩子们在燕园成长	陈松岑（40）
燕园长屋与迷糊协会	段宝林（58）
世事沧桑话住房	周先慎（76）
湖畔的雪泥鸿爪	谢 冕（91）
半间“小屋”旧事琐忆	孙玉石（98）
我与筒子楼	马振方（111）
我的生命的驿站——20 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	严绍璜（115）
往事杂议	赵祖谟（138）
筒子楼的回忆	张 晓（149）
家住未名湖	么书仪（154）
19 楼的回忆	商金林（167）
我的那间小屋	钱理群（179）
北大“三窟”	温儒敏（183）
燕园筒子楼琐忆——从 19 楼到全斋	葛晓音（191）
我们家的八年筒子楼生活	岑献青（200）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陈平原 (214)
44 楼杂记	陈保亚 (220)
我在燕园住过的那些地儿	杜晓勤 (227)
筒子楼杂忆	漆永祥 (242)
末代筒子楼	孔庆东 (248)
附：北京大学校园简图	(255)

形形色色“筒子楼”

陆颖华

引 子

当知道要开展一个“写写筒子楼”的活动，心中就涌起一股写作的冲动。其实以我现在的精力与体力，根本就谈不上动笔。2006年，我患了子宫内膜癌。虽做了手术，但体力一直虚弱。更麻烦的是，我双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目前我右眼的视力是0.16，左眼更差，只有0.06。可以说已是“半盲”。

可是说起过去多少年的住房情况，我就思绪万千。作为拥有双重身份——大学教师和家庭主妇——的我，更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从1952年来到北京大学，到1982年搬到中关村，30年里，我曾多次搬家。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住房，大多并不是典型的“筒子楼”，可是我又似乎都依稀可以看到“筒子楼”的影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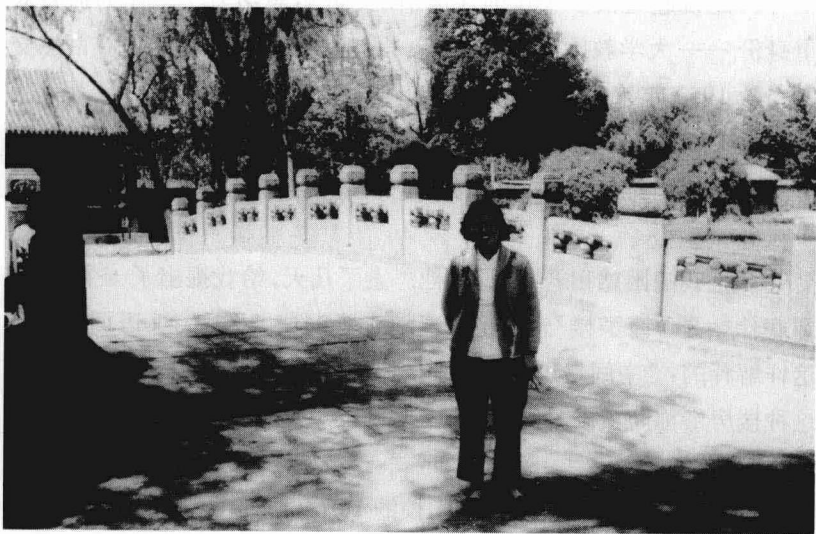
我把我的困惑和老伴说了，他思索了几天，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筒子楼”？他还认真地查了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住房，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楼房。这种楼房俗称筒子楼。”（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北京第184次印刷，第1268页）

我最熟悉的筒子楼是我们学校的19楼，那是中文系的男教师宿舍。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找人。它本是为单身教师修建的集体宿

舍，以后由于房源紧张，一批刚结婚的年轻教师没有家属住房，也就以此为家了。我把脑子中的 19 楼和《词典》对筒子楼的解释对照着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句：“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楼房。”《词典》里说，筒子楼里“没有厨房”，可是走进筒子楼，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厨房”。那本来还算宽敞的过道，挤满了煤炉子。从东头望到西头，像一个大筒子，整个过道就是一个大厨房。至于没有厕所，似乎不够准确。如果说没有一家一户自己的厕所，那是不错的。而公共厕所，筒子楼里还是有的。

—

我是 1952 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的。当时，全国高等院校学习苏联进行大调整，北大也不例外。北大和清华、燕京的文理科合并，成为新北大，以原来的燕京大学作为校址。我到北大正赶上学校搬家。我是在沙滩老北大报的到，没有多



摄于 1956 年秋，西校门内白石桥头柳荫下，我时年 26 岁。

久，就进了新北大所在的燕园。可以说，我是红楼最后一批的北大人，又是最早进入燕园的北大人，这是我一生中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初到北大，我还没有结婚，理所当然住的是集体宿舍。在沙滩，我住在一栋叫“灰楼”的女生宿舍。“灰楼”和“红楼”只是一字之差，知名度可大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它是我北大生活的第一页，是永远难忘的。在燕园，我的第一个住处是“均斋”，现在叫“红三楼”。燕京时代，它是男生宿舍。我到燕园的时候，它是女研究生的集体宿舍。建筑古色古香，濒临未名湖。

“均斋”是一个系列建筑中的一座。整个系列是七栋建筑，从西到东被依次命名为：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不知为什么没有“魄斋”，我想或者是因为“魄斋”听起来像“破斋”不好听）。其中，像健斋以后就成了“筒子楼”。均斋没有，但也改换命运，成了办公场所。

想当年单身宿舍的生活还是蛮惬意的。两人一间房，必须的家具：床、桌、椅、柜，一应俱全；吃饭有食堂，拿北京人的话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基本上没有感到对厨房的需要；洗澡，宿舍里就有淋浴间。比学生时代住的集体宿舍条件好多了。但是，也有一条不太方便，晚上还要定时熄灯，常常看书看得正高兴，灯没了——这就引发了一件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可笑的事：

和我同屋的也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叫朱家玉（北大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她跟随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主攻民间文学。我刚到北大是做杨晦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外国文学。但不久就被学校调到负责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开始，办公室设在临湖轩，那是美丽幽静的燕园中最美丽幽静的景点之一。过去是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我被调到学委会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睡过的一张床还放在我办公室外面的厅内，空闲着。下班回来，我和“小豆”（朱家玉的外号）聊起这件事。有一天，她忽然提出：“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办公室去看书，看个够。困了就睡

在司徒雷登的床上。”我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当时正是冬天，又是夜里，屋里气温比较低。我们坐在床上挑灯夜读，虽有暖气，仍是比较冷，顺手把原来就放在床上的一床鸭绒被拖过来盖在腿上。夜深了，我们困了，丢下书本，和衣盖着鸭绒被睡了一夜。

50多年过去了，如今小豆已不在人世。但这件青春时代的往事还是那么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

二

我在均斋安静的生活不长，只短短的几个月，就开始谈恋爱了。接下来的就是考虑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成家，首先需要有一间房。没想到，为了申请到一间房，我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应该说，燕京大学当时给北大留下的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房产。除了均斋这样的集体宿舍，家属宿舍也有不少。

当时，全校有两片相当高级的住宅区。一片是现在图书馆西南面的燕南园（俗称南大地），另一片是现在北大附小附近的燕东园（俗称东大地）。都是别墅小楼，前面有院落。里面住的都是著名的教授。两位副校长，江隆基和汤用彤住在燕南园63号，一座小楼一家一半。在燕南园居住的还有中文系的林庚、王力、魏建功先生，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先生，力学系的周培源先生，经济系的陈岱孙先生等；在燕东园居住的有中文系的杨晦、游国恩、高名凯、岑麒祥先生，西语系的冯至、罗大冈、俞大纲先生，历史系的翦伯赞先生等。

在老燕园的清代名园中，还遗留一些四合院，现在成了不少新北大学著名学者的家。在德、才、均、备四个楼的北面，有镜春园和朗润园，镜春园里有中文系的吴组缃先生，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哲学系的何兆清先生，物理系的叶企孙先生；朗润园里有文学研究所的孙楷第先生。西校门对过的蔚秀园里有中文系的袁家骅先生，地理系的侯

仁之先生。

除了这些住宅以外，燕园内外还有不少供家属住的老房子。

当年的燕京大学规模较小，据说全校的师生员工加在一起不过一千多人，尽管它留下了不少的房产，但还是不能满足新北大的需要。所以，在三校合并的时候，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燕南园的南边，盖了许多学生宿舍楼和单身教师楼。家属宿舍建在中关园，盖了二百多套红砖平房（最初计划是住10年，实际上住了三十多年），按职别和家庭人口每套分别为100平方米、75平方米、55平方米和35平方米，有厨房和厕所。我们中文系的王瑶、周祖谟、季镇淮、冯钟芸、林焘、章廷谦（川岛）、吴小如、姚殿芳先生都居住在此。另外，还在中关园兴建了一座公寓式的楼房，被命名为一公寓。稍后，又在平房的南面盖了二、三公寓。中文系的朱德熙先生就住在二公寓。

三

我爱人是南京大学同学，叫胡建中，他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广播编辑部任编辑。他们单位的条件，不论是办公还是住房，当时也都比较差。那时还没有广播大楼，他们在西长安街现在邮电大楼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大院里办公。他的住处，在西单，是一个用洗澡堂改建的简陋的旅馆，叫“金城旅馆”。现在，这座旅馆连同它所在的胡同都消失了。

我们两人，一个在城里，一个在西郊，离得较远。那时从北大进城，只有一趟32路公共汽车。到了西直门，还要换车才能到西单。从长远考虑，我们的家安在北大比较合适。他在单位要一个床位。由于路远，他们工作忙，会议多，平时他就住在那儿，到周末回家。

这样从我准备结婚起，就开始向学校要房子，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尽管学校接收了那么多老燕京的房子，又新建了一批新的家属宿舍，我还是排不上队。

没有办法，我在1953年8月1日建军节结婚的时候，只得把新房安在了东单建中外祖父家。婚后，每星期六，也是到城里度周末。可没有多久，我怀孕了。这时候，我不得不加紧了申请住房的步伐。经过一番奔波，终于在我的领导宋超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她是江隆基副校长的夫人，是学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这年冬天在镜春园78号公寓，要到了一间房子。这是我和我爱人的第一个自己的家，第一个自己的小窝。

镜春园78号坐落在上面提到的几个四合院的后面。在老燕京遗留的房产中，这是档次较低的一个。它是一个大杂院，都是平房，原来是燕京大学单身教职工的住房，和筒子楼一样，没有厨房。

大院四周有围墙。从南面的大门进去（无门），右边，也就是东面，坐北朝南有两排平房。筒子楼的房间，是门对门，隔过道相望。78号的这两排平房，一前一后，每排五间，一样大小，整整齐齐，像两列士兵一样。筒子楼的厨房设在过道，78号的厨房设在房前的走廊里，比筒子楼的厨房略为宽敞，只是处于半露天状态，风雨天比较麻烦。

大院的左面，是一溜朝东的西厢房，房间很小，厕所、水房都在其中，也有几间住房。

1953年初冬，我怀着老大，搬进了新居。我们住在第二排靠围墙的头一间。我接受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学习生炉子。

筒子楼一般有暖气，78号没有，每家都配备了一个取暖的炉子。那还不是后来的蜂窝煤炉子，烧的是小煤块和煤球。自己到煤场订煤，有工人给送到家。

我搬进78号的时候，正是冬天。屋里没火是绝对不行的。可是对于我这个从小生长在长江以南的人来说，怎么生煤炉是一窍不通。虽有人指点，但技术拙劣。煤炉生着了，不懂得及时添煤，不懂得怎样恰到好处地让它空气流通。往往是早上出门的时候，炉火很好，但下午回来，炉子灭了。忙了一天，回家就想赶快休息，再没有生火的精神了。钻进被窝，上面再盖上羊皮大衣，也就一夜睡到天亮。人说，

孕妇是双身子，热量大。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谁能不怕冻？

慢慢地我就注意掌握生炉子的规律。早上起来，先把炉子下面的插板拔掉，捅炉子，把烧过的煤球、煤块，还有煤灰，清除干净。添上新煤。一会儿，炉火旺起来了，再把插板插上，留一点小缝通气；再用水调一点煤末，用小铲子轻轻地盖在还没燃着的煤上，用通火棍从上到下凿出一个小孔，让煤炉上下通气。然后盖上炉盖，或者做上一壶水。对了，还有一点千万不能忘记，临出门把炉子通烟囱的阀门打开，让煤气可以顺畅地从烟囱跑出去，以免煤气中毒。

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钻研、实践，我终于掌握了生炉子的规律，从此，炉子再没有灭过。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这是我成家后学会的第一件本领。（以后虽然我搬进了有暖气的住房，屋里不用再生火，但是这门技艺在厨房里做饭还是用得着的，一直延续了30年，到用上液化气才算歇手。）

天气逐渐暖起来了，但是炉子不能熄灭，只能把它挪到走廊上。因为我发现，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了。

搬进新居不久，我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化。1954年2月，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应邀来我校讲授文艺理论课程。全国许多高校都选派了教师来我校听课。中文系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系里为了培养人才，专门组织了一个研究生班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这时，高校教师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改为在夜大学上课，我所在的学委会取消。我就申请回中文系工作。杨晦先生同意了，但决定我不再做研究生了，改任助教。但首先要向苏联专家学习，不但听毕达可夫的课，还要听和他同时来我校任教的另两位专家讲授的“俄罗斯文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结业时要参加考试。这样，我既要重当一回学生，还要履行助教的职责，担任一个班的大一写作的教学工作。我苦干了一年，在最后通过毕达可夫口试的时候，我得了一个“5”分。杨晦先生主抓苏联专家的工作。结业考试他也参加了，就坐在毕达可夫的旁边。当专家给我打分的时候，我看到了杨晦先生赞许的目光。

这一年真难熬啊！这样的工作量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何况我还是一个正在给婴儿喂奶的母亲。

我生老大是1954年6月。一般人都盼望头胎是个男孩，我却盼望生个女儿，连名字也取了，叫“海燕”。有同事开玩笑说，要是男孩呢？我说，那就叫“山鹰”吧！结果真是一只“山鹰”。

搬到78号以后，我还在食堂吃饭，可是成了家、有了孩子，和单身时期在食堂吃饭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听课，专家用俄语讲课，翻译翻成汉语。两个学时的课，差不多要用三个小时。下课的时候，食堂都要关门了。我急急忙忙往回赶，自己虽然也饿得不行，可家里还有两张嘴等着呢。我一回到家，先忙着给孩子喂奶，同时让保姆去食堂吃饭。保姆吃了饭，买一份给我带回来。喂饱了孩子，也不管带回来的饭是热是凉，划到肚子里，又该开始下午的工作了。

北大校园很大，从我听专家课的俄文楼到镜春园，步行总要走20分钟。现在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有自行车，可那个时候老师有自行车的都很少。很难买到，也买不起。1955年，学校工会定购了一批自行车，是民主德国的产品，Move牌，紫红色，女车，可以分期付款。我咬了咬牙，买了一辆。我不会骑车，当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的有一位马老师，是从地质学院借调来的。他听说我要学车，非常热心地答应教我。东操场离我家不远，是个学车的好地方。马老师给我讲了讲要领，然后就让我骑上车，他在旁边扶着把保护。以后他看我骑得有点在行了，就站到了车后。没多久，我就学会了骑车。从我上课的教室到我家，一路上行人不多，汽车更少，我就大着胆子骑。这样，上下课就能节约不少时间。

1956年夏天，老大两岁了，进了托儿所，我稍稍松了口气。暑假里，工会组织大家去东北参观，我也参加了。刚参观完“鞍钢”，回到沈阳，还没有去大连，我感到身体不适，就提前回北京了。一看医生，才知道我又怀孕了。